

五十年文萃


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五十年文萃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五十年文革: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建系 50 周年 /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大学出版社, 2002. 3

ISBN 7-81074-254-X

I. 五... II. 内... III. 社会科学—文集
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8974 号

书 名	五十年文革
编 者	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
任 编 辑	石 斌
封 面 设 计	丹 森
封 面 字	康 庄
出 版	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(010021)
发 行	内蒙古新华书店
印 刷	内蒙古民族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6.5
印 数	1—1000 册
字 数	400 千
版 期	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7—81074—254—X/G·27
定 价	全套(24 册):精装 768.00 元,平装 64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总序

布赫

新世纪伊始,内蒙古师范大学迎来了自己的50岁华诞。为庆祝建系50周年,师大汉文系出版了大型丛书——《五十年文萃》。这套丛书集中了汉文系50年科研、教学与创作的主要成果,反映了汉文系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。看到此书,如临故土,如闻乡音,倍感亲切。欣喜之余,我很想为这套丛书写上几句话,以示祝贺。

内蒙古师大汉文系在内蒙古地区建系最早,是全区中学语文教师的摇篮。尽管内蒙古条件艰苦,困难重重,但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,汉文系全体教职员教书育人,桃李芬芳,源源不断地向全区乃至全国输送了一批批合格人才,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我作为内蒙古人,感谢你们多年来付出的辛勤劳动。

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经过50个寒暑春秋,我欣喜地看到,内蒙古师大汉文系不断地发展壮大,目前,已成为校内教师力量强大,学科建设完备,科研成就显著,学生人数众多的龙头专业。在新的世纪里,师生们正

以饱满的热情、科学的态度、不懈的努力,改变着内蒙古教育的落后面貌。我相信,随着我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完善、繁荣和发展,内蒙古师大汉文系一定会抓住机遇,迎接挑战,建设成适应新的历史发展形势的、富有开创精神的专业,并进入我国该专业高等师范教育的先进行列。

大学是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、适应现代化社会需要的高级人才的地方。我以为,除了教育和培养职能之外,大学还应将科学研究工作放在重要地位。综合性大学应该如此,师范大学亦应如此。从总体上来看,我国综合性大学科研氛围、力量与条件较之师范院校要强。但是,我感觉到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,没有受此影响,他们在教书育人的同时,积极投身于科研活动中,兢兢业业,自强不息,这是令人欣慰的。我们知道,科学研究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,决非一朝一夕、举手投足之易。汉文系的教师们数十年如一日,甘于寂寞,甘于淡泊,以做“知识人”为乐,实在令人钦佩。其实,耐得住寂寞与清贫,正是一位学者,也是一位教师应有的精神品格。在商品大潮席卷之下的今天的学术界,这种精神尤为可贵。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正是因为有这种可贵的精神,才使他们在条件有限的环境中,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科骨干,产生了相当丰厚的科研成果。我心里真是感到由衷的喜悦。

据我所知,内蒙古各大学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套像师大汉文系这样规模庞大、数量众多、质量较高、学术性强的丛书。汉文系此举,让人感到那里的学术气氛是浓厚的,成果是显著的。同时也看得出汉文系的领导集体

堪称教育事业的“有心人”，他们以新的观念引导着这个集体，努力培养教师，特别是青年教师严谨的治学精神，尽量为教师们的科研活动创造有利条件，使教学与科研密切结合，协调一致，相得益彰。我们知道，没有理想，没有勤奋，没有学识，没有孜孜不倦的探索，便无所谓教育。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精进不休的精神、科学严谨的态度是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发扬的。当然，我们也必须看到，目前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教师并不重视科研工作，认为一位教师只要上好课便完成自己的天职了。这实乃一种偏见。我希望，持有这些观点的同志们借鉴一下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经验，谦虚谨慎，重视科研，从而使教学与科研比翼双飞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教好书，育好人。

《五十年文萃》证明了内蒙古师大汉文系的学术研究实力。丛书精选了汉文系 50 年来，特别是目前在职的教师们多年辛勤钻研的成果，共 24 卷，近 1000 万字，其中包括论文、专著和创译三部分。

丛书中所收的学术著作、论文囊括了语言文学专业的各个领域，从语言到文学，从理论到实践，纵贯古今、横跨东西。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，有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探讨，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西方现当代文学观的解析；在文学实践的研究方面，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，包括文学思潮、作家、作品，完全进入了他们的视野；在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中，东西方文学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；在语言文字学研究方面，从古代汉语的虚词，到现代汉语的语法词汇，都进行了系统、深刻的研究。此外，对中外文化、中国书法艺术、语文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也颇有成就。总之，丛书中所收专著与论文，均以实事求是的态

度、科学的研究方法、新的理念对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,体现了研究者扎实的学养功底和创新的学术眼光。

丛书创译编有小说、散文,也有诗歌和翻译作品。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,我个人认为,此编虽然数量不多,又是业余的创作,但足以表明汉文系教师良好的文学修养、外语水平和勤奋刻苦的精神。在商品大潮冲击的今天,文学创作也日益商品化了。但我感到,丛书所收作品并没有商品的味道。创作者严守着一条准则:为人生而写,为理想而作。我在这些作品中得到的就是一种愉悦,一种享受。我建议广大的文学爱好者都来读一读,在可能的情况下,尝试着写一写,那将会使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

总之,这是一套值得肯定的、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丛书。我相信,这套书籍不仅会推动内蒙古的教育及科学事业的发展,而且对我国的教育及文学研究、文学创作,也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。我知道,师大汉文系的教师们正在努力,成果还会一天天增加,成绩还会一天比一天昭著,我真诚地期待着师大汉文系更加美好的明天的到来。

值此内蒙古师大汉文系建系 50 周年之际,我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。希望你们再接再厉,再创辉煌。

2002 年 3 月

序 言

王志彬

万奇同志的专著《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》，即将出版，我很高兴。此前，万奇同志就曾对我说，这本书出版的时候，要由我来写一篇序文，我以为这是份内之事，义不容辞的；现在，我读着书稿的校样，时有年华似水，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的感慨，往事历历，恍然如昨。

万奇同志16岁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，淳朴的圆脸上还带着自然的童稚气。他勤奋聪敏、多思好问、且诚挚率真，执著于自己的爱好，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。留校工作后，经过在助教进修班的专业学习和初步的教学与科研实践，他的潜力和优长渐渐发挥出来，各项工作都很出色，屡获褒奖；为文治学也年有进境，既博闻强记，又求真务实，先后参加了《中国写作理论辑评》和《中国写作理论史》的编写工作，积累了较多的学术资料。同时写出了一批有思辨力度和实践意义的论文，如《技法与技巧》、《散文的形与神》等，都表现了他敏锐、独到的见解。后来，他到南京大学进修，师从裴显生教授得以深造，开阔了学术视野，掌握了学术动向，磨炼了治学方法，因而层楼更上，有了新的进步。一方面，他关心、思考文章写作理论研究中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力图正本矫弊，补缺使完，写出了《论写作学之本体》、《写作基本规律再认识》等既富学术品位，又具现

实意义的优秀论文，先后受到内蒙古自治区与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奖励；另一方面，他着手准备进行专门、系统的文章写作理论研究，攻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性论著，并参与了《基础写作学要义》的策划、编写工作，主编完成了《写作技法实用指要》一书，稍后又写出了长篇论文《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概览》，受到学界的好评。相继于此此前此后，他被破格擢升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；并被选举为内蒙古自治区写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；聘任为中国写作学会及其现代写作学委员会的副秘书长。

由此我感到，《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》一书的诞生不是偶然的。万奇同志的阅历、学养，为《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》的著作、出版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万奇同志的成就，虽得助于某些客观因素，但归根结蒂是“内因”起了决定的作用。

《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》最突出的特点，是它以桐城派文论为中心，上溯下延，对历代文章理论作了分门别类地综合梳理。它归纳其同，界划其异，理枝循干，整派依源，比较清晰地阐明了中国文章理论发展的脉络及其通变关系，形成了一个古今贯通的完整系统。作者在《文用论》中指出：“文用论”的原型，诞生于先秦时期。它由叔孙豹的“不朽说”、荀子的“明道说”和墨子的“尚用说”三个部分组成。“后代‘文用论’尽管说法不同，却都是由此‘生长’出来的。‘不朽说’引出了六朝的‘扬名后世’；‘明道说’衍化出唐宋的‘明道—载道—是道’；‘尚用说’，嬗变为清代的‘经世致用’。”“可以说，先秦之后的各代‘文用论’在深层意义上都是其‘原型’的复活。”这样“原始以表末”的概括和论述，贯注于全书各个部分，虽因力求择其要而难免略有所疏，但它开拓了中国文章理论研究的途径和范围，梳理了中国文章理论的来龙去脉，对于全面地理解、批判

地继承传统文章理论，借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章理论之本体，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新贡献。

《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》的另一重要特点是：它古今相参，密切联系实际，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鲜明的针对性。它既以写作实践作为检验历代文章理论的标准，又以经过验证、信而不爽的传统文章理论来解析写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，指导写作实践，实事求是地辨正然否，针砭文坛时弊。作者在《文律论》中阐发刘勰“执术驭篇”之说时，明确指出：“以今天的眼光看，刘氏的‘执术驭篇’也有借鉴意义。时下文坛也是‘弃术任心’，‘各竞新丽’：或曰‘后现代’，或曰‘新体验’，或曰‘新状态’。然‘声悴’、‘理拙’，偶有‘义华’、‘文泽’，也因‘借巧僥来’，而‘后援难继’，只是‘玩名词’、‘玩文学’而已。因之，执术驭篇，刻不容缓。”这种以古鉴今的批评，亦屡见诸于全书各部分，如对桐城派的总体评价；对“文气论”、“文法论”的辨析；对“文要论”、“文戒论”、“境界论”的探究，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。尽管对它可能会有某些歧见，但它也会促进人们的思考，辨明是非，献可替否，与某些不疼不痒的“为文而文”之作，是迥然有别的。

《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》还有一个突出特点，就是讲究章法，注重框架。它精当地选义按部，擘肌分理，既将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的方方面面，组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，又将其条分缕析地解剖为若干方面，分之则独立成篇，合之则浑然一体。全书包括绪论、结论、本论三大部分，绪论阐述桐城派的产生和嬗变，结论辨析桐城派的理论贡献和总体评价。而本论则作为全书之主体，将桐城派文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作者论、创制论、文本论、品用论和源流论五个方面；每一方面中，又分别包括若干分论；分论则纲目条款相包相容，层次分明，各自独具其特定的

中国文章理论的内涵和概念。有些地方还附以图表，分别标示有关内容之间的并列、主从、分总、先后之关系，简而有法，要言不繁，表现出作者执术驭篇、精虑造文的功力，为学术著作的撰制，提供了一个可资化用的范例。

古人有云，“学无止境”。仅以文章而言，我国作为古老的文章大国即有着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珍贵遗产，有待于“钩深极”，研究借鉴。新时期以来，我国的文章理论与写作理论并驾齐驱，有了长足的发展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许多先行的学者为此做出了令人钦敬的卓越贡献。惟“岁月飘忽，性灵不居”，自然规律不可抗拒。在学术领域中，也是“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”的。由万奇同志我想到了许多与他同时代的青年学者，他们正在茁壮成长，奋发竞进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。他们必将踏着先行学者铺垫的学术台阶，再攀新高，创造出中国文章理论的新辉煌。

余心有寄，是以为序。

1999年4月18日
于内蒙古师大一楼

目 录

序 言	王志彬(1)
绪 论	(1)
桐城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基础	(1)
桐城派的嬗变	(8)
本 论	(16)
作者论	(17)
性情论:文章必根乎性情	(17)
修养论:义理、考证、文章,三者兼善	(28)
创制论	(39)
文法论:言之有序,法而无法	(39)
文机论:兴会之到,机应于心	(53)
文气论:全在气字上用功夫	(62)
文戒论:文家须知操觚之忌	(79)
文本论	(94)
文类论:学文必先辨门类	(94)
文要论:为文应知八字诀	(106)
境界论:虚实相合,境外有境	(130)
品用论	(143)
文用论:扬名载道,经世致用	(143)
文评论:品鉴古今鸿篇巨制	(153)
源流论	(164)
文源论:文学起源,其在斯乎	(164)

文迁论:文章变迁,各有由然·····	(177)
结 论	
桐城派的理论贡献和对它的总体评价·····	(185)
附 录	
桐城派自认所承之古文家系统表·····	(192)
桐城派及阳湖诸子之关系表·····	(192)
桐城派文人系统表·····	(193)
桐城派文人传表·····	(194)
桐城派文人传表(续)·····	(210)
参考书目·····	(212)
后 记·····	(215)

绪 论

桐城派，是方苞始创、刘大櫆“继之益振”、姚鼐确立的清代文章流派。它延续 200 余年，与清朝“国运”相始终，造就了知名文士 600 余人。其时间之长、影响之大，在中国文章史上，乃至世界文章史上，都是罕见的。它“学行继程朱之后，文章在韩欧之间”，有明确的“道统”、“文统”，所以自成一派；又因方、刘、姚皆为安徽桐城人，故曰“桐城派”。

桐城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基础

一、时代背景

一种文章现象的产生，总是与它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有刘勰“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”的感叹。虽然由此而走向极端的“时代决定论”是不可取的，但考察文章现象，从时代入手，还是必要的。

清朝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。它集历代统治经验之大成，统治中国达 268 年之久。它和历代王朝一样，建立之初，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。由于它是非汉族政权，故这种集权较之历代更甚。而中央集权的实质是皇权，因此，说到底，中央集权的加强是皇权的加强。清代皇帝的言论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：

今天下大小事务，皆朕一人亲理，无可旁贷，若将

要务分任于人，则断不可行。所以无论巨细，朕心躬自断制。^①

无知小人，辄议朕为烦苛琐细，有云：人君不当察庶务者。……此皆朋党之锢习未去，畏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，以自便其好恶之私。^②

本朝家法，自皇祖皇考以来，一切用人听言大权，从无旁落……^③

朕亲阅本章，折中酌定，特降谕旨，皆非大臣所能参予。^④

显然，“大小事务，皆朕一人亲理”，“用人听言大权，从无旁落”，高度集权达到了顶点。

政治的集权，反映在思想文化上也必然是“大一统”。为了维护皇权，清朝大兴“文字狱”，以剪除“异端分子”。桐城派影响较大的戴名世，就是清朝“硬”的一手的牺牲品。戴名世（1653—1713），字田有，一字褐夫，号药身，又号忧庵。20岁开始“课徒养亲”，28岁入县学为诸生，后4年为拔贡，补正蓝旗教习，授知县未就。34岁由贡生入就国子监。此后历时17年，到处流浪，后归桐城南山故里，旋又客游姑苏。约在43岁时，迁居金陵，结识了方苞。53岁中举。4年后中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49岁时弟子尤云鹗等将他平时所写的文章刊刻为《南山集》。59岁时，御史赵申乔奏劾他“私刻文集”、“狂妄不谨”、

① 康熙语，见《东华录》康熙朝卷91。

② 雍正语，见《朋党论》。

③ 乾隆语，见《东华录》乾隆朝卷28。

④ 乾隆语，见《东华录》乾隆朝卷80。

“语多狂悖”，结果被下狱腰斩。

为了笼络人心，清朝又倡导尊孔读经，鼓吹程朱理学。康熙曾大修孔庙，祭孔时行三跪九叩之礼，并封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先王”（至圣先师）。他特别推崇程朱理学：

宋儒朱子，注释群经，阐发道理，凡著作及编纂之书，皆明白精确……今经五百余年，学者无敢疵义，朕以为孔孟之后……朱子之功，最为宏矩。^①

在《御纂朱子全书》序言中又说，朱子“文章言谈中，全是天地之正气，宇宙之大道”。可谓吹捧至极。其目的无非是用孔孟之道、程朱理学驾驭人心，维护其统治。论及文章写作，康熙则明确指出：“文章以发挥义理、关系世道为贵，骚人词客，不过技艺之末，非朕所贵。”“务使阐发义理，裨益政治。”^②雍正也说：“文之载道，与政治相通。”^③乾隆与康、雍二人的看法相同：“朕所好者载道之文。”^④可见，他们都要求文章载孔孟、程朱之“道”。他们还反对“排偶文辞”，认为文章语言应该“明晰”、“清真雅正”。而桐城派以程朱理学为“道统”，以韩欧文章为“文统”，文字尚“雅洁”，与清朝统治者的观点“暗合”，故能应运而生。

桐城派的道统、文统是其始祖方苞确立的。他尊奉程朱，原因有三：（一）早年无锡的刘言洁就曾劝他“尽弃时文”之学，

①《东华录》，康熙朝五十一年二月。

②康熙十二年癸丑辛酉上谕，十六年十二月庚辰上谕。

③雍正十三年辛巳上谕。

④乾隆十三年三月庚辰上谕。

以治古文，又劝他“讲索宋儒之书”^①，这对他影响很大，到后来他把“学行继程朱之后”作为立身祈向。（二）他崇尚“不为一身之谋，而有天下之虑”^②的仁人志士，并表示：“为国家担当世教，为天地保护生民。”^③在他看来，“讲世务，以备天下国家之用”^④是“程朱之学”的主要内容，故以程朱为宗。这是主要原因。（三）《南山集》案起，他被判死刑，后经人说情，免诛；且为皇帝召入南书房。皇帝尚理学，客观上也要求他以程朱为宗，“适者生存”。以上所言，决定了桐城派的道统是程朱理学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康熙把方苞作为“施恩”对象，原因也有三：（一）方苞是名士，影响大，“施恩”于他，能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。方苞考取秀才后，学使高某挟之至北京，进了国子监，声气广通，名誉鹊起，他的时文，被称为“江东第一”；他的古文，更受推崇：“韩欧复出，北宋后无此作。”^⑤康熙也认识到这一点：“方苞学问，天下莫不闻。”^⑥因此对他格外开恩。（二）方苞是因给《南山集》作序而牵连入狱的，是从犯，这是“施恩”的客观条件。（三）方苞以程朱理学为立身祈向，与康熙所尚相同。方苞因祸得福，桐城派也就有了产生的现实基础。

由此可见，清朝的文化统治政策是软硬兼施。桐城派是清朝提倡理学、笼络人心“软”政策的产物。

二、历史基础

①《方苞集·再与刘拙修书》。

②《尹氏夫人李氏墓志铭》。

③《与陈古成书》。

④《李刚主墓志》。

⑤《方苞集·再与刘拙修书》。

⑥《两朝圣恩恭纪》。